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TOWARDS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

(第2版)



[美] 亨利·吉鲁 (Henry A. Giroux) 著

张斌 常吟 左继容 傅书红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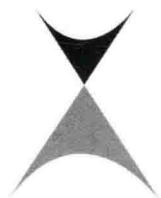
阎光才 张斌 校



教育科学出版社
ESPH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

(第2版)



[美] 亨利·吉鲁 (Henry A. Giroux) 著

张斌 常吟 左继容 傅书红 译

阎光才 张斌 校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何 艺
版式设计 杨玲玲
责任校对 张 珍 金 霞
责任印制 叶小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 第2版/ (美) 吉鲁著; 张斌
等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6. 4

书名原文: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Towards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ISBN 978-7-5041-9873-0

I. ①教… II. ①吉… ②张… III. ①教育学 IV.
①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1584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2053 号

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 (第2版)
JIAOYU ZHONG DE LILUN YU DIZHI (DI 2 BA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21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博祥图文设计中心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7.25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1 千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THEORY AND
RESISTANCE IN EDUCATION**

TOWARDS A PEDAGOGY FOR
THE OPPOSITION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序 一

保罗·弗莱雷

我相信，这些年来我所坚持的教育学立场与我为别人作序的风格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因此，我写过的一些序言，并没有对文本进行严谨的分析，更多的是想激发潜在的读者展开批判性阅读。我并不认为作为某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不宜向读者和盘托出自己对它的全部看法，相反，我更愿意激发、邀请读者与要读的书之间建立起一种愉悦的关系。

我开始密切接触亨利·吉鲁令人激动的思想，是在不久前的一个夏日午后，在我位于瑞士的办公室里。两三年后，经历了十六年流放生活的我终于回到了巴西。当时，有一家杂志社给我寄来吉鲁的一篇文章，当然，作者的名字是隐去的，其中附带着一封信，要我提点意见，因为这篇文章探讨的是我的研究著作。文章态度严肃、表述清晰、论述严谨——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带着同样的严肃态度，我一读再读，然后给那家杂志社的编辑写了回信，表明了我的观点——这篇文章“早就”应该发表。

在这封信里，我也表达了想要见一见作者的意愿，那将会使我倍感欣喜。几天后，我收到了吉鲁的信，还有他的几篇文章。拜读过后，我进一步加深了最初的印象——这些文章包含着毋庸置疑的思想力。

自此，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读吉鲁的文章越多，我就愈加确信：如果不对他的文章进行思考、做出反应，就无法跟他本人或其著作真正地“保持接触”。也就是说，吉鲁的思想不容许那些接近他的人保持漠然。他的激进教育学观点和他对激进教育学的捍卫本身就带有激进性质。吉鲁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没有任何宗派色彩，同样，在他的思想中也没有为错误的二分法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

吉鲁非常清楚，生活在这个世界并跟这个世界一起生活，就意味着不

断地体验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也非常清楚最难的事情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却要避免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如过高地评价主观性以至于损害了客观性，或者过高地评价客观性以至于忽略了主观性。他的激情，同样还有我的激情，既不在于主观唯心主义，也不在于机械客观主义，而在于将批判性融入历史之中。这正是吉鲁所提倡的激进教育学存在的理由。

吉鲁的这本书充分而深刻地探讨了这个既易于理解又绝非肤浅的关键问题。《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是一本具有重要意义的书，任何对教育、社会理论以及批判性实践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序一为本书第1版序言。）

序 二

斯坦利·阿罗诺维茨

1973年，在布朗大学召开的批判理论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亨利·吉鲁。我发言之后，他向我走过来，随即与我针对教育和批判理论进行了认真的交流。他的专注和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鲁似乎不喜欢闲聊——当时我就注意到了，这是一个缺陷，在大多数学术领域内都行不通。他好像从未参透学术职业里的规矩和惯例。即使是那时的美国学术圈，也并不是一个激烈地讨论社会、政治等学术议题的场所，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无非是在闲聊，大部分话题是有关工作的琐事。

后来，我收到了吉鲁的来信，他邀请我去波士顿大学演讲。那时他在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任教。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和合作伙伴，这种关系至今也没有改变。我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吉鲁既没有学会轻松地谈话，也没有脱离他在这个领域的独特立场。与许多研究者和学术人相反，他依然是教育领域内少数专心致志的知识分子之一。尽管往往是孤军奋战，吉鲁仍坚决否定将教育视为手段而非目的的工具理性。他坚持认为，应该超越保守派和消沉的自由派之间的界限去思考问题。现在，他依然是在孤军作战。

尽管已经问世近二十年，吉鲁的这本著作今天仍然富有新意，与当前的争论密切相关。事实上，本书正是在教育理论的危机达到临界点的重要时刻得以再版的。在主流文献中，几乎已经找不到能提出根本问题的教育理论，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学术人已经放弃了希望，认为不可能再把学校转回去变为真正的求知场所。研究者们已经默认甚至公开支持这种观点——应该由商业利益来驱动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一旦进入本科阶段的最后两年，你就会发现，工作与职业准备似乎已经成了从幼儿园到14年级

的主要目标。过去，阅读和写作一直受到重视，因为能给学生带来愉悦，而且在他们的能力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现在，就业市场已不再接受文盲，读写于是仅仅被看作学生必需的“技能”。学校应该培养学生具备公民资格，这是传统上学校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今天，这种观念已经鲜有人提及。许多学校都把资源浪费在购买计算机及其他技术设施上，而不是想方设法地通过聘用更多的教师、减小教师的工作量并提高薪水以便吸引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等途径来缩小班级规模。事实上，技术培训现在通常处于与人文学科、科学以及社会研究等重要课程相平行甚或更优先的地位。

更为糟糕的是，许多人对公共教育是否能够满足学生需要提出了疑问。保守主义者和愤世嫉俗的自由主义者都认为，城市学校早已过时，而郊区学校和中产阶级的公立学校，尽管获得了较多的资助，也只不过是政府竭力主张的职业学校。令人悲哀的是，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要复兴公立学校。相反，我们已经步入私有化时代。现有的关于教室过度拥挤、教材陈旧或短缺，以及教师职业倦怠、收入过低、工作过度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要废除公立学校——虽然并没有“废除”公共资金。这迫使我们支持学校和理智知识的商品化，允许家长使用教育券去私立学校的供应商那里为他们的孩子“购买”教育，并对营利性学校进行“认证”，以便“解救”教育。然而，这些学校既赚取家庭的钱，也从公共财政中获利。

于是，关于教育的批判理论和批判教育学日益被边缘化，失去了生命力。教育研究现在所认可的，是那些毫无生气的公共教育的恶俗理论框架。相应地，也许是因为绝望，理论已经被各种关于教师入职培训、学习理论、学校组织、“领导力”、课程和管理、“评价”以及政策等问题的研究所取代。在几乎所有上述领域内，研究者们认可了里根改革以来所发生改革的假定，学校被理解成传递公认知识的训练营，配有相应的纪律“法庭”和警力，学生则被视为军事院校的新成员。在城市学校，教师被看作警察。在这种环境中，几乎没有为理智或阅读和写作的美学价值留下任何余地。在面向后现代性的讽刺性转向中，许多教师教育机构都停开了关于

教育基础的项目，或者对课程内容进行压缩，把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合并成一门课，而且只开一个学期。如果我们不再质疑学校的既定意义或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语境，那么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会被化约为发现和应用那些便于管理的技术，而教学则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应试训练的职能。

学校里充满了吉鲁所谓的“技术理性”，这种说法源自法兰克福学派。各种基于现实的考虑湮没了人的想象力，以致有人提议，最受欢迎的教育改革应是推翻公共教育，推广几种类型的商品化学校教育。一些进步教育家、研究者和政治家们已经对教育券进行了批评：家长选择私立学校，使用教育券，使得公共资金流向私立学校，城市公共教育因而更加陷入绝境。同时，他们也公开表达了对建立私有化同时受公共财政资助的“特许”学校的反对意见。然而，他们的反对意见都是出自防卫角度的。不用说，右派对公共教育的无情攻击，与在自由派中间蔓延的根基颇深的反智主义殊途同归。

早在私有化运动和新近有关“市民社会”的争论展开之前，吉鲁就为家长和教师们描绘了学校的图景——一个民主的公共领域。然而，大部分教育研究者和激进分子对这个图景即使没有全然否定，也都果断地将其忽略。本书是对这些人的有力反驳——他们试图使所有儿童的教育职业化，尤其是对工人阶层、黑人、拉美裔和其他从属群体的儿童而言。吉鲁也不赞成传统的课程结构。在本书中，读者将会发现一个富有创造力且极为复杂的观点：如果学校要成为家长、教师和学生都能参与的民主公共领域，那么，教育就必须诉诸批判社会理论。通过本书以及他的第一本书《意识形态、文化和学校教育过程》，吉鲁吸引了众多崇拜者，也招致很多人的批评。但是，鲜有人尝试过在理论和政治视野上与他相匹敌，也没有其他哪位作者——不管是追随他的，还是反对或轻视他的观点的——能够拥有本书所表现出的那种视野、果敢以及雄辩。因为相比这个研究领域的其他研究而言，吉鲁提出了一个依旧紧迫的课题：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学校教育服务于谁的利益，如何理解那些促进或阻碍学校教育目标的情境。吉鲁大胆地把哲学、学校教育政治学与课程、素养问题以及教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但很少有人追随他的这一创举。可以确定的是，很多人都同样

致力于吉鲁所热衷的事业，并在教育研究的传统框架内创立了独特的领域。他们已经成为专家，详尽地阐释了吉鲁所关注的全部问题的一个或某个方面，这些问题最初在本书、吉鲁的另一本书《学校教育与为了公共生活的斗争》、他与我合著的《重围中的教育》以及其他著述中都有所提及。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处于一个低期望值的时代。大部分思考教育问题的人，不管是教育界人士、知识分子还是激进主义者，都轻视在这些著作中体现出的乌托邦精神。他们即使并非出自本意，似乎也已经准备好以旁观者的姿态，见证作为公共领域的教育、作为愉快活动的学习以及作为崇高事业的理论的急速衰落。然而，如果还存在一线希望——教育重新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学习变成创造性活动，公共生活则摆脱当前的广告和消费循环，成为就关乎共同体利益的事务真正进行对话和辩论的场所，那么，必然需要像本书这样的著作，像吉鲁这样的作者。

目 录

序一 / 001

序二 / 003

导论 受教育期望、公共教育学与抵制的政治 / 001

第一部分 理论与批判话语

第一章 批判理论与教育实践 / 019

导言	019
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与背景	021
理性与工具理性批判	022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	028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分析	033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精神分析学的分析	038
一种关于教育的批判理论	045
结语	050

第二章 学校教育与隐性课程的政治 / 052

关于隐性课程的观点	056
隐性课程：重新定义	068
结语	077

第三章 学校教育中的再生产、抵制与适应 / 078

再生产理论	081
走向抵制理论	109

第二部分 抵制与批判教育学

第四章 意识形态、文化与学校教育 / 119

文化与意识形态：相互冲突的范式遗产	122
意识形态与教育理论和实践	137
意识形态：定义、定位与特点	140
意识形态、表征与课堂物质实践	152
文化、学校教育与权力	158

第五章 公民教育中的批判理论与合理性 / 164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理论基础	166
美国意识形态	168
三种合理性模式	171
公民教育理论纲要	186

第六章 素养、意识形态与学校教育的政治 / 198

工具性意识形态与素养	201
交互性意识形态与素养	207
再生产性意识形态与批判性素养的教育学	213
保罗·弗莱雷与批判性素养	216

结论 迈向新的公共领域 / 222

注释 / 230

参考文献 / 241

译后记 / 263

导论 受教育期望、公共教育学 与抵制的政治

我想首先为批判性知识分子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辩护……没有真正的对抗性批判，就没有真正的民主。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认为，否定批判性知识分子，无论是健在的还是已故的，例如马克思、尼采、萨特、福柯以及其他的人，就如同拒绝公共利益一样危险。这种行为其实是复辟活动的一部分。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1]

世上只有一件事情比铭记你曾是自由之躯更加可悲，那就是，忘记了你曾是自由的。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悲哀的了。

——马修·金 (Mathew King)，
拉科塔族长老 (Lakota Spiritual Elder)^[2]

我很清楚我们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源于何处——它源于同情心，以及对他人遭受的苦难的深切体察。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3]

时代在不断地变迁。不同的历史境况向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挑战，需要我们筹划一系列不同的解决方案。关于可能性与变革的问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人们为了理解、参与进而变革权力的不同运作方式，在不同的场景中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形塑政治的。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政治不是万灵药，它不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也不可能告诉我们，从事政治工作的人究竟应该做什么。政治的含义、构建方式以及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方式等都不是纯粹的政治自身的问题。^[4] 我们首先需要考虑历史偶然性、

社会语境与社会变革等问题，它们形塑任何具有可行性的文化政治形式，对于发展一系列既具有自我批判力，又能对社会负责的关于批判和可能性的语言十分关键。变化中的历史情境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要求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且经常会要求人们使用全新的话语体系。有时，产生于一种历史情境中的理论，到了另一种历史情境中即使并不是毫不相关的，也已经完全过时了。任何一种批判理论都规定着它所试图描绘的某一特定社会语境提出的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反过来规定着理论的类型。

同样，本书也要受制于不断变化的历史情境。本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写作意图是直面关于教育的主流观点，重申教学活动的基本政治属性，以及将教育学同社会变革相联系、将批判性学习同学生带入课堂的个人经验和历史相联系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建构一个可以容纳论争、抵制行为以及可能性的学校教育空间。当时，在右翼学校教育观的强烈影响下，课程反映的是一种偏狭的关于世界的主流观点，学校要么被当作工作场所的附属物，要么被技术理性模式所支配，成为评估活动的测试与分类工具，于是，反映外部社会秩序的更大范围的不平等在学校中得以再生产。由于自身的阶层、种族、性别等因素而被边缘化的学生，很难参与到形塑其日常生活的教育话语、教育学实践以及师生关系中来，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话语和社会构成方式之中，他们经常会被压制和边缘化。如今，在北美大陆内外，尽管这些既有传统的影响力和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它们仍然对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施加着强烈的影响。

本书认为，对于任何批判理论而言，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思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它认为教育具有指导性，其基础性的假设是，人类生活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而非早已被决定好的。^[5]弗莱雷的乌托邦理想也是本书的基础。首先，当前有许多令人沮丧的悲观主义通过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立场困扰着教育话语，而弗莱雷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战胜这些悲观主义的理论假设。例如，在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话语中，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将学校视为只能不断重复现实的机构。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所谓的现实，就是培养资本主义的国民、顺从的工人和意见一致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教育的目

的在于教育学生适应现存秩序。而对于很多激进左派来讲，正如激进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言，学校如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积极卷入道德和政治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构。^[6]这些立场拥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学校既非冲突的场所，亦非可以将学习同社会变革相联系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都失去了成为批判性行动者的能力，要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卫道士，要么成为国家强制力的软弱附庸者。同样，教育学要么被化约为一套毫无意义的技术装置，要么就是在人文主义话语的伪装下，粉饰学校制造潜在的道德与政治规则的行为。

本书的前提是一个重要的乌托邦假设，即为了变革既有社会秩序，教育者的思考和行动必须跳出常规。无论是对于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悲观主义思想而言，还是作为革命理想的来源——希望，都是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在这个前提之下，理想民主与真正民主间的差距才能被切实地当作批判性学习与实践斗争的目标。正是关于希望的政治启发了本书。这种政治是参与性的，而非救世主式的。它表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构想自由与公正能够超越空想，即将理想与变革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与通过政治（以及教育）的手段可以实现的目标联系起来”^[7]。本书中所蕴含的乌托邦理想既无意对未来进行立法，也不是对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所谓的“作为能力的可能性”^[8]进行实际操作的抽象乌托邦。相反，给予本书灵感的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理想。它既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伦理话语，以便抨击人们在面对社会变革时所抱持的那种泛化的犬儒主义思想，又能“在现实走向和真实的历史可能性中”^[9]为我们搭建一种实在的政治架构，作为批判的基础，为社会变革开启新的可能。

20世纪80年代初，一种令人绝望的悲观情绪同时在左翼和右翼中间弥漫。针对这种状况，本书提出了“乌托邦式”的理想：学校能在教育学生批判性思考、勇于冒险、抵制那些形塑他们日常课堂生活的主导性压迫形式等过程中富有成效地发挥作用。这一理想试图通过辨明学习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使教育教学活动更具政治性；为学生提供条件，以便其获得各种批判能力，扩展人类作为行动者的可能性；为教师成为反抗性的知识分子重建空间，使他们不再是顺从的技术专家或去技能化的企业寄生虫。当

然，这里的反抗性知识分子并不是完全拒斥权威的，而是批判性地参与权威的建构，从而发展出一套旨在鼓励学生学会如何管理而不是被管理的教育学原理。同时，教师自己也应该作为积极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参与建构民主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

随着时代的变迁，悲观主义的倾向越加显著。教师被禁锢在前所未有的牢笼之中；强大的新自由主义势力对现行的学校系统肆意攻击，试图将学校变成营利的机器。迪士尼与微软的成功经验，如今变成了我们定义学校教育、学习和教育目标的标准。学校不再是公共产品，而成为私人产品；作为公民身份的唯一形式，消费主义逐渐地被灌输给年轻人。学校教育中的危机实质上更加体现了民主本身的危机，而要想理解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所受到的冲击，就不能忽视各种不受市场逻辑制约的公共生活所受到的更大范围的冲击。另外，任何关乎政治的抵制主张都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内部事务，而要在有所区分的前提下，在更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力量结构中来理解。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那些将学校这类机构视为公共产品的人与那些鼓吹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文化视为人类社会至高法则的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紧张。

大众传媒、右翼知识分子和联邦政府花言巧语大肆宣扬的自由市场之合理性，已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通过对民主价值和公共理念的竭力攻击，他们找到了切实可行的表达方法。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有关学校教育与社会公正、持续性贫穷、健康护理不足、城市种族分离、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要么在公共议题和公共政策的清单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么被视为脱口秀节目的素材。这样一来突出的便是个人的不幸，仿佛这些不幸既与公共生活无关，也不需要由集体行动来争取可能的改善措施。由于市场法则先于国家法律成为公共产品的监护人，政治逐渐地被驱逐出权力之外。政府一方面并没有调节好资本的优先性与其掠夺性商业旨趣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没有调节好其与那些构建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的非商业性旨趣和非市场化空间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对于批判性的公民身份和民主化的公共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盛行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掌控了公众的想象力。在这些话语之中，没有政治或经济变革的词汇，没有集体想

象力，没有社会行动者质疑学校教育私有化和商品化、残酷的高失业率、持续的工作不稳定等问题，也未能为目前不得不从事兼职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个争取其本应拥有的权益的空间。新自由主义者一致将这一问题归因于公众自身。市场驱动的消费力量持续地挑起人们的欲望，旨在塑造一种市场身份和市场关系，而此二者最终只能像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曾经提到过的那样，完全是“思想本身的覆灭”^[10]。

公众遭到持续攻击，视一切为消费品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企业文化逐渐占据优势。在这样的语境中，本书所强调的批判教育、抵制、政治和社会变革等一系列议题，较之以往才显得更为重要。无论是对于教育家，还是对于所有关心民主的公共生活的人来说，都是如此。当然，任何关于政治和抵制的理论都必须考虑到环境条件、行动者以及引发社会变革的当前斗争水平。20世纪80年代，在写作本书时，我没能对制度约束和外部社会结构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试图挑战主流教学实践和像分轨教学这样的系统性压迫模式的教育家、教师和学生而言，制度约束和外部社会结构对他们的抵制方式施加了压力。同时，我过分强调了学校中的阶层支配形式，而忽视了根植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中的支配形式。此外，我对以下几个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将学校教育同对激进民主的需要相联系，将教育学的意义扩展至诸如传媒类的文化机构，将学校教育的危机同青年人面临的普遍危机相联系，等等，这些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尽管在近些年的工作中我已经开始着手对其进行研究^[11]，但在最初写作本书时，我的确没有给予它们足够的重视。幸运的是，近二十年来，如罗杰·西蒙（Roger Simon）、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帕特里夏·比泽尔（Patricia Bizzell）等很多学者，都清楚地阐述了这样的论点：若想改变学校的状况，人们终究无法回避外部制度环境，正是在这种外部环境的重压之下，相关的、多种多样的支配形式才能在学校中生成并得以再生产，而种种孤立的、碎片化的课堂抵制行为也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教育者必须认识到，抵制具有很多层次。在学校内部，教师与学生采取了多样而复杂的抵制形式。不仅如此，在不同的情境下，在政治斗争的不同阶段，抵制的表达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当然，抵制并不是人们